

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 参考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
工农貿經濟教研室农业經濟

1963年·北京

說 明

为了函授“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教学需要，我們將一部分有关的文章汇集成册，并按“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函授讲义的体系，編排为四个部分，供同志們学习时参考。

由于我們的水平所限，加以时间仓促，編选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同志們批評和指正。

中國人民大學函授學院
工農貿經濟教研室農業經濟組

一九六三年七月

目 录

第一部分(一至三章)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語选 1

第二部分(四至七章)

- 許涤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31
郑 远：学习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41
王耕今：以粮为纲全面地发展农业生产 50
《人民日报》社論：积极组织和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 56
《人民日报》社論：大力发展棉花等经济作物 60
《人民日报》社論：因地种植的好榜样 65

第三部分(八至十章)

- 《人民日报》社論：把农业科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70
侯学煜、胡式之：合理利用多种自然条件和资源发展农业 75
刘巽浩：論用地与养地 85
曹国兴：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几个問題 95
项 南：农业机械化的若干問題 107

第四部分(十一至十三章)

- 薛暮桥：价值規律和我們的价格政策 126
高征繩：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城乡关系 141
周 誠：生产队的經濟核算必須加强 149
楊 波：对积累和消費問題的几点意見 156
楊培新：农业生产中积累、分配和生产費用的关系 172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語选

(一)一个地方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讀者們推荐。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問，就“繞开社走”的人，現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謂“坚决收縮”，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繞开社走”的一種表現。不过他們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這是他們的話）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們手里拿着刀，一砍，他們就繞开麻煩問題了。他們說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據說簡直困难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駁倒了这一种說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經驗，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們的办法就是学习。他們的口号是“書記动手，全党办社”。其結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戶，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計三年時間內，已經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內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戶占全区农戶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項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們現在有理由向人們提出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这个

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就是书记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烦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的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都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个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

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迴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最後，我們要感謝這篇文章的那位沒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滿腔的熱情，生動的筆調，詳盡地敘述了一個區的合作化過程，這對於全國的合作化事業會有不小的貢獻。我們希望每個省、每個專區、每個縣都有一篇到幾篇這樣的文章。

（摘自《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版，第3—6頁）

這裡介紹的合作社，就是王國藩領導的所謂“窮棒子社”。勤儉經營應當是全國一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方針，不，應當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麼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几十年時間。几十年以後也需要執行勤儉的原則，但是特別要提倡勤儉，特別要注意節約的，是在目前這幾十年內，是在目前這幾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現在有許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種不注意節約的不良作風，應當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個省每一個縣都可以找到一些勤儉辦社的例子，應當把這些例子傳開去，讓大家照着做。應當獎勵那些勤儉的、質量最高的、各方面都辦得好的合作社，應當批評那些浪費的、產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摘自《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版，第16頁）

這個三戶貧農的合作社，幾個月以來，在全國農村中產生

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給貧农壯了胆。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
人民出版社版，第27頁）

这个材料有很大的說服力。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問題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問題。只要我們党对于处理合作化問題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們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簡單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領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沒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条件的問題，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時間，也就可以了。条件可以边做边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东川口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說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問題。其中有所謂“倒宣傳”，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組織和劳动管理方面的問題，这个材料描繪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結果出現了逐年增产的巨大成績。事实証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檢驗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
人民出版社版，第44—45頁）

这里說的是李順達領導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包括二百八十三戶的大社。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工夫，已經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的互助組时期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已經由第一年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了一万一千多元。一九五五年，社員每人平均收入粮食八百八十四斤，比抗日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社已經做了一个五年計劃，实行三年的結果，生产总值已經达到五年計劃的百分之一百零点六。这个合作社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自然条件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
人民出版社版，第101頁）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實現初級形式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實現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苏省崑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兩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許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嗎？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輸一法。群众中蘊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时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們遇見得还少嗎？这些只会循着

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計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現，他們总是不贊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現，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經驗，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藥方，奉劝人們不妨試一試。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冊，
人民出版社版，第587—588頁）

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兩年計劃，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有些人說計劃難做，为什么这个乡能做呢？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計劃，包括的項目，比这个計劃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業、商业、金融、綠化、卫生等。那怕粗糙一点，不尽符合实际，总比沒有好些。一个省只要有一兩個县、一兩個区、一兩個乡做出了相当像样的計劃，就可以迅速傳播开来，叫其他县其他区其他乡仿照办理。說起來怎样困难，其实是并不那么困难的。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冊，
人民出版社版，第598頁）

这个經驗应当普遍推广。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建立了党的支部，又有了几批互助組的乡，只要按照浙江邓家乡的路線去做，一兩年内就可以比較健康地比較少出毛病地在一个乡內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使生产提高一步。有些同志

认为合作化很困难，一定要出很多毛病，因此畏缩不前，不敢推广合作化，只是因为他们脱离了浙江邓家乡的这样一种领导路线。而浙江邓家乡的路线（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同河北遵化县第十区、安徽凤阳县城西乡的路线一样，不是别的，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版，第658页）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問題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鹤毛能上天。”鹤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

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鷄毛能不能上天的輿論問題。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問題。几千年以来，誰人看见过鷄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給以批評，它就会使許多貧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貸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傳鷄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張旗鼓地宣傳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鷄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鷄毛确实要上天了。

……我們的許多地方党组织沒有能够給貧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們，上面还没有給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給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們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調。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頑固的，也不敢議論鷄毛能不能上天的問題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
人民出版社版，第777—779頁）

(二)共产党的乡村支部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乡已经有了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七个互助联组，三个常年互助组，十四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以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有把自己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的，现在在全国还是不少的。不但支部，可能还有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一点。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赖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
人民出版社版，第1125—1126页）

此件有用，一切农村的党支部都应当这样做。

根据几处地方的反映，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副职，是必要的。各地都可以设立起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之下，专责进行政治工作。

在一个乡的范围内组织“互助合作网”或者如同陕西杨河坝乡那样组织“联社委员会”，看来是有益处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读者可以看到，这个乡经过政治工作，使那些做贩猪生意的社员不去贩猪了，使那些把公牛养瘦了的社员把牛养肥了。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

人民出版社版，第1223页）

（三）树立贫农在合作社领导机关内的优势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

人民出版社版，第37页）

这里所說的問題，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須團結的，不團結中农是錯誤的。但是工人階級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團結中农，實現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貧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現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兩個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楚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貧农必須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團結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現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員會，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須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貧农（包括現在的貧农和原来是貧农的新下中农）委員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以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貧农（再說一遍，包括現在的貧农和原来是貧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們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貧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現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版，第701—702頁）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問題。各級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們，对于这个問題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須建立现有貧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兩部分上中农作为輔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貧农和中农的團結，巩固合作社，发展

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沒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貧农就不能團結，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許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們认为建立貧农优势的問題，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貧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確有建立貧农优势的必要。現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貧农大部分已經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資料又多，沒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資料缺乏的問題。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現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貧农或者建立貧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們认为这种意見是錯誤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貧农群众，才能比較順利地办到，否則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比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現在已經变为新中农，但是他們同老中农比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較高的觉悟，他們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間的下中农，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間的下中农比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間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們必須注意：（一）現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貧农，（二）新中农中間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間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們，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們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們中間觉悟程度較高、組織能力較强的若干人，加以訓練，組成合作社的領導骨

干，特別要注意从現有貧農和新下中农里面選擇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來一次划分階級成份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們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針，这个方針应当公开告訴农民群众。我們也不是說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說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們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貧农（包括現在的貧农和原来是貧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領導的时候，再去吸收他們入社，不要为了打他們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們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們入社。已經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繼續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說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資料少一点也可以組織合作社，很多貧农和下中农組織的合作社已經證明了。我們也不是說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須树立貧农（再說一遍，包括現在的貧农和原来是貧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內，他們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組織成份方面，他們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兩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合作社的指導方針方面，必須实行貧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損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須建立貧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貧农和損害貧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的經驗，充分地告訴我們：建立貧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團結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險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綫。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緊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貧农的优势領導。結果，貧农揚眉吐氣，中农也心悅誠服。本文作者还告訴我們一件大事，就是一个情况混乱的合作社，

究竟是将它解散好呢？还是加以整顿，使它由混乱走到健康好呢？这样的合作社，整顿巩固是不是可能的呢？本文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不应当去解散那些“三等社”，而应当去做整顿工作。经过工作，三等社是完全可以变为一等社的。这种经验，全国各地已经不少，不止是长沙县高山乡一处。

（摘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版，第857—860页）

（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交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这种工作，在全